

《康复时代》:从揭出病苦到疗救的可能

■ 赵月斌

王涛兄从事文学创作近四十年,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。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,再到《伊甸园》四部曲、《大河》三部曲,以及最近出版的《康复时代》四部曲,他的作品始终关注个体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,并尝试在叙事方式上不断创新。《康复时代》四部曲可以看作他文学探索的新阶段,它不仅延续了此前对历史与现实的宏观关照,也在主题建构、叙事手法、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。

王涛的小说创作总有一种史诗情结和宏大的叙事抱负。从《伊甸园》四部曲到《大河》三部曲,他的作品始终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展开。《伊甸园》四部曲以个体命运为切入点,探讨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漂泊感和生存困境,文本充满象征意味,具有明显的寓言特质。《大河》三部曲则在更具现实感的基础上,尝试通过大跨度的时间推进来刻画时代变迁,其叙事层次较为丰富,兼具抒情性与历史纵深感。

《康复时代》四部曲无疑是王涛创作上的一次新探索。如果说此前的作品更多地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个体的沉浮,那么《康复时代》则更加贴近当下,甚至可以说,它的关注点已经完全落在了现代社会的“病苦”上。以“疾病”为线索贯穿四部曲,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鲁迅以来的病相隐喻传统,但它的拓展不止于此,小说在不同层面上呈现了社会肌理的裂痕,以“康复”为目标,但这一目标似

乎始终无法真正实现。文本的书写带有某种焦虑感,这种焦虑不仅是对个体病痛的关注,更隐含着对时代征候的思考。

首先,从创作抱负来看,《康复时代》体现了王涛对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关照,既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种种症候,又试图在历史深处寻找病根。他希望通过“疾病”这一主题串联个人与时代的关系,并以一种近乎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式剖析社会。小说不仅涉及个体的病痛与心理困境,更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病态,如权力异化、伦理瓦解、信仰危机等。可以说,这是一部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作品,作者的写作目标不仅是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病痛故事,更意在像鲁迅那样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,甚至试图提供某种“康复”的可能。

其次,在结构与写法上,《康复时代》四部曲有着明显的创新。小说在叙事手法上借鉴了许多民间文学的传统,例如大量运用了传说、俚语、戏谑式的表达,以及带有寓言色彩的结构安排。这些写法使文本在沉重的主题之下仍然保持了一种灵活的叙事节奏,让作品在思想性之外,也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。同时,小说采用了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,使得不同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,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叙事网。这种手法不仅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感,也使其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类似“拼贴”的效果,与“康复”这一主

题的断裂感、冲突性相呼应。

此外,“乌洛镇”这一虚构地标的延续,也是王涛的重要贡献。从《伊甸园》四部曲到《康复时代》,乌洛镇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空间,类似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,马尔克斯的马孔多,以及胡安·鲁尔福的科马拉。乌洛镇承载着历史的沉重,也见证了社会的变迁。在《康复时代》中,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,更成为一种精神空间,映射出中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。通过这一文学地标,王涛建立了一种具有延展性的叙事空间,使不同作品之间形成某种内在联系,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版图。

最后,小说在文学批判性的继承与发扬上,明显受到了鲁迅及“五四”以来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。鲁迅曾以病态隐喻来批判国民性,《康复时代》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拓展,不仅关注个体心理层面的疾病,也关注社会结构性的病变。小说中弥漫着一种“康复”的可能性,尽管这种可能性在小说中常常显得虚幻甚至讽刺,但至少,它提供了一种探讨未来的可能空间。

(作者系著名评论家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山东文学》杂志执行主编)

《冠县·乡村记忆》之记忆

■ 石林

“冠县乡村记忆工程”是冠县县委、县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工程。编纂《冠县·乡村记忆》是其中的一项重点工作之一,我有幸参与其中。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,又生于农村,长于农村,对农村有深厚的情结。现在虽然离开那片土地,但留给我最多、最厚重的还是农村广阔天地里氤氲的醇香和浓浓的乡情。

团队

编写《冠县·乡村记忆》,由县委牵头组织开展。经过精挑细选,成立了县级编纂委员会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县编委会最初由8人组成,中途又增添2人。这些编委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同志,有党史研究室原主任、史志办原主任、文史资深研究员、乡土民俗专家等,他们大都参与过文史书籍的编写、编辑工作,可谓经验丰富,阵容强大。编委会成立后,同志们迅速进入工作状态。工作方案分为乡镇(街道)篇和村庄篇两部分,整体以突出村庄文化特色为基调。编委会分为3个小组,每个组负责6个乡镇(街道)。每个小组对接自己分管的乡镇,负责对乡镇编纂人员的培训,包括乡镇篇、村庄篇的写法、内容的挖掘以及材料的审核、编辑和后期的审校等。

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,我们开始对乡镇编纂人员进行培训。我和王平主任负责的乡镇(街道)有清泉街道、崇文街道、东古城镇、斜店乡、范寨镇和万善乡。在培训前,我查阅了每个乡镇(街道)的人文地理资料和区域特色相关文献,在总方案下渗透属于自己乡镇的内容,如清泉街道的古城文化以及县政府驻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特点,崇文街道的抗战时期红色武装和现代交通区位优势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,斜店乡的丰厚红色文化资源以及现代绿色蔬菜种植等。

乡镇编委会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,非常重要,一般由乡镇退休干部、老教师和一些文化人组成,要求必须了解本乡镇的情况,有高度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培训采用“以已知带动未知”的方式。已知,是让大家在写作上有切入点、代入感、认同感,不致茫然失措、无所适从。根据方案,突出自己村庄的特点,按照自己的叙事方式按部就班编写就可以了;未知,是让大家认真对待每一项内容,真正写出属于自己村庄的内容,高质量完成村庄乡村记忆的编写。写已知,要写全面;写未知,要在挖掘的基础上力求充分、详尽。

审稿

在四轮培训后,我们进入正式审稿阶段。审稿最重要的一项是帮助村庄做好文稿内容的挖掘。如何发现文稿内容的缺失呢?一是根据我们自身对村庄的了解,发现问题。譬如,村子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、风物遗存或者人物事迹,有的文稿中没有出现,有的写得浅显,就需要提醒编纂者继续挖掘充实。二是在“大事记”部分叙述时,如果时间跨度较大,就要引导编纂者是否遗漏了有价值的事件。三是根据文稿本身透露的信息,挖掘更深层的内容。如这样一些信息:村庄在××年被评为“植树造林先进单位”,××年修建桥梁一座,××年开办油坊一处,××年人物参与活动,等等,如果后面没有展开叙述,就可以引导编纂者写出相关的具体情况,放在大事记、深层记

忆或者村庄百业、村庄故事等栏目下。这样,既做到前后呼应,互相补充,不遗漏,又能体现村子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的解读,真正成为一个个时代的回忆。

乡村记忆的编纂坚持内容为王。无论语言运用多好、格调多高,都不能掩盖内容的缺失带来的文化空洞。只有内容全面了、丰满了,才能真正体现一个村庄的特点,才有真正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。很多时候,随着我们的引导,会引起村庄编写人员的共鸣与思考,进而想到一些重要的线索或回忆起一些重要的事件,甚至会连带挖掘出其他珍贵资料。这时,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直接输入到电子稿上,或者是让他们回村再次找特定人物走访挖掘。每每与村庄参与编纂者座谈,我们总是传递出对村庄历史的责任;有些东西失去了,无法复原,固然可惜,留下遗憾。但如果人们把它忘记了,从心头彻底抹去,那我们便成了历史的罪人。

村庄的文稿要杜绝抄袭,避免雷同,避免重复。这些问题一般出现在“大事记”“村民风俗”等部分,尽管某个时段一些大事可能差不多,但各村要写出自己的特点,写出自己村庄的东西;村民风俗尽管差不多,但像民间所说的“五里不同俗,十里改规矩”,一些习俗不光是不同村庄千差万别,即便是一个村庄,不同姓氏、不同支脉也可能不同,所以,一定要写属于自己的不同习俗,才会展现乡村文化的多样性、地域性和差异性。对于人物的录入,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根据掌握的材料,不夸大、不粉饰,直言其人其事。对于一些不符合收录条件的人物或负面的内容,一经发现资料中收录,马上进行删除。而对于一些外地人员,在县内某领域做出过历史贡献,或为当地人做出过巨大牺牲,为人们所世代记忆,我们也把他们录入进来,表达冠县人民对他们的记忆,也体现我们这部丛书的开放性。

情怀

收集村庄记忆要找村庄的有心人,善于记忆并愿意讲述的人是有心人,能动笔写的人更是有心人中的有心人。范寨镇靳大宗老师虽年过古稀,但是记忆力非常好,对范寨的许多人和事都如数家珍,并且热情高涨,积极参与。不仅如此,他还想方设法把各村文化人邀请到一起,组成志同道合的团队,共同书写范寨记忆。还有临清市公安局原政委占祥同志,其家乡是冠县范寨镇贯庄,村庄人物涉及一两百人,他通过走访、电话沟通,反复求证,力求全面、力求准确;为了达到年份记忆的效果,他还亲自绘图标注近10个,力求更加清晰地还原村庄原貌,这是其他乡镇村庄所少有的。

东古城镇南村原党支部书记郎保兴利用自己熟络的人脉,以及对东古城镇几十年的事件全面掌握的优势,主动请缨,挂帅东古城镇乡村记忆编委会,带领大家走遍全镇84个村庄,收集挖掘整理,并亲自把关。斜店乡辛庄李彦忠主任,耐心细致、反复询问,一点一点地积累,一点一点地核对,一遍一遍地修改,遇到点滴线索,他都不遗余力地抽丝剥茧般搜索挖掘。在完成乡村记忆编写工作的同时,他还一手完成了村史馆建设的整理工作。

高学业主任是个老水利人,但热爱文字和民

俗文化,虽已年高,但干起工作来像年轻人,奔走在崇文街道辖区村庄的大街小巷,将当地人风物、史实遗存随手记录下来。清泉街道杨巍主任文笔很好,他在整理资料时力求尊重史实,虚心接受县编委的意见,踏踏实实、不遗余力,除完成自己村庄的编写工作以外,还帮助编写了其他几个村庄的乡村记忆。张尹庄何建民、杨铁丁两位老师,针对回族特色村的特点,着重编写回族进入冠县的缘起和发展,以及村庄清真寺建设,还有回族的民俗特色、查拳历史和文法等,脉络清晰、内容翔实,再加上村庄出现名人较多,多是人物和事迹同时介绍,成为村庄叙写的一个特色。

在审稿过程中,一些村庄的党支部书记、干部都专程到县里,全程参与了稿件的审阅,真正把乡村记忆编纂工作装在心里,放在心上。正是这一群富有家乡故土情怀的人,走到一起,聚在一起,共同努力、密切合作,才完成了乡村记忆编纂这一浩繁的工程。

成书

经过逐层搜索、挖掘、整理、审核、修改以及再审、三审,历经两年多的时间,全县18个乡镇(街道)陆续定稿。定稿之后,县编委会的同志们又进入到最后的修正与校对阶段,经过5个多月夙兴夜寐的奋战,修改一校对一再修改一再校对,《冠县·乡村记忆》丛书终于在2024年9月30日正式出版发行。

《冠县·乡村记忆》丛书,共计18卷、1700余万字。每卷包括县情篇、乡镇(街道)篇和村庄篇。这是一部冠县近百年乡村生活的大百科全书。丛书囊括了全县乡村地理风貌、村庄来历、历史变迁、家族传承、村庄经济、教育、风物、人物,以及民俗文化、美德故事、乡土文学,等等。既有孝老爱亲、磨砺竞争、传统的崇德扬善,也有人们对土地的坚守与执着和纯朴的精神品质,以及在劳作中的绘制与创造,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。正是这前仆后继的精神与文化的传承,才使得丛书在乡土星河中熠熠生辉。丛书除了有史志的记叙与铺陈,也有乡土事件和艺术的艺术剪辑,让读者在烦冗枯燥中不失趣味,原汁原味的乡土中充满着浓浓的文化气息。内容翔实,虽然个别内容啰嗦赘述,但也是基于我们想从这些语言里传递出某种信息,为后世的考证传递更多的依据,也想从不同的角度让不同的人得到收获。

开始时的志忑让我坚定信心、勇于求索,完结时的志忑让我回望来路,更惜文脉:一路风雨酿成眼底星光,于释然中,得见文化源远流长,幸与乡土共襄。

共寿千年,文载春秋;乡村记忆,永志流长。



雨后的黄昏,窗外的梧桐叶子滴着水珠。屋子里光线有些暗,我翻开书,被作者笔下的那条蛇所吸引——那间即将被拆除的老屋以及截在断砖上弹跳不已的蛇尾,一汪淹不死苇子却弥漫着焦糊味的水坑,就这样不声不响闯入了我的眼中。

作为同样从鲁西平原走出来的人,我呼吸过那种土腥气,还有秸秆搭在屋顶经年雨淋的霉味儿。记忆中,家乡的小溪旁,常有蛇在草丛里游过的痕迹,我也曾经历过面对这种特殊物种时的心悸。一晃,离开老家已四十年,有些往事也逐渐淡忘了。读着这篇《低处》,一些熟悉的场景涌入心头。

作者没有再写乡愁和怀旧,他把童年的经历写成一个人的精神记忆,讲述如何在生命的低处以沉默对抗着毁灭。文章从一条土花斑斓的长蛇写起,这条蛇一反常态,大大方方地卧在那里,它的腰身如一条粗壮的牛尾,体长又如锁链。作者没有急于赋予蛇某种象征意义,而是让蛇先作为真实的存在,它张开嘴巴,蛇头一伸一伸地,在风中摇摆着,竟似活了一般。这是一种接近生物观察式的细节描写,它构建了此文真实性。但很快,蛇蜕皮了,那层空壳便成了一条蛇蜕。而小伙伴苇子从那堆碎蛋壳里挑起像粗线头一样的小蛇——它在这里开始变形,从实物变为幻觉,把自然物引入记忆的线索。

“我”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孩子,又是一个回溯的成年人。这是一种双重身份,作者的视角在草地、老屋、水坑中体现出来,当他把自己想象成一条蛇时,人与蛇的界限便不再分明。

蛇作为让人恐惧的动物,是童年认知边界上的异类,是超出我们的记忆和见识的。作者写孩子们的惧怕,不写尖叫,而写头发发麻、浑身发紧,这些身体的变化,更接近真实的童年心理。

蛇是神秘的,文章里更神秘的是蛇与老屋的关系,“蛇知道老屋要拆了,它是留恋这个家,才出来看一看吧。”奶奶这句话,将蛇提升为“家神”般的存在。在乡土中国的普遍认知中,蛇从来不是单纯的动物,它是小龙、是宅神,是土地的精灵。作者没有批判这种迷信,而是让奶奶的声音自然流露,这恰恰是对乡土认知方式的尊重。

文中对老屋的描述,不只是展示物理空间,更是时间的追溯,作者对老屋的描述充满了足够的耐心。这是家族的见证者,有着几代人的身体记忆。当奶奶说蛇知道老屋要拆了,蛇与老屋被编织进同一个命运的叙事,蛇的出没是老屋存在的体现,拆除它意味着蛇失去栖居之地。

在现代性的拆迁进程中,老屋不仅是建筑的消失,还是一种存在方式的根除,这个老屋确实太老了,这个“老”字里有复杂的情感,不是嫌弃和惋惜,它暗含一种对过往本身的尊重。老屋会拆除,但蛇不需要,当老屋消失,蛇将去往何处?这个问题悬在本文的空白处,像断尾蛇的舞蹈一样令人不安。

苇子是文中复杂的人物。他是蛇的对立者,蛇安静、隐忍、神秘;苇子躁动、暴力、直接。苇子对蛇的暴力不是单纯的残忍,而是混合了一种恐惧、好奇和征服欲的复杂情感。当断蛇开始胡乱舞动时,苇子眼里升腾起一层迷蒙的水雾,这个细节至关重要:苇子哭了。就在暴力实施后的一瞬间,这个孩童的形象突然被赋予了一种悲剧性的深度。

作者对苇子的态度,没有道德审判,而是让他在乡土环境中获得某种可理解性。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、娱乐稀缺的年代,蛇是孩子们从动物身上获取快乐的唯一途径,苇子的暴力,是少年对不可预知世界的探视,这不是纵容,而是对那个特定环境里人性的有限的悲悯。

苇子后来死了——人们在窝棚后面一个打坏坑里面发现了他的尸体。这个死亡有些突兀,像蛇的出没一样不可预测。作者没有解释死因,只写他的两条苇秆一样的细腿还搭在坑沿上。苇子的死与蛇的不死,再次形成对立。人如此脆弱,蛇却那么顽强,

低处,生命的原乡

——读谭登坤散文《低处》随笔
张薇

这种对立充满宿命论——它让我们思索,在乡土世界的认知中,人与非人生命的边界究竟在哪里?

文章写于当下,塑造的是童年,这种回望本身就意味着,当年的场景已经逝去,我们无法在现实中去栖居,只能循着文字重返故乡。质朴的描述在这里是一种风格,面对乡村的过去,最诚实的态度是用它的语言来讲述它,而不是用现代主义的语言来描述。就像那条马颊河,从源头缓缓流来。

必须承认,读这篇文章,我的个人记忆不断地被触发,我童年生活的村庄,也有老屋、奶奶和蛇的传说,但我记忆中的村庄已消失,老屋已不复存在,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房屋和人却是陌生的。

作者的叙述,让我重返那个世界,然而这种重返伴随着痛苦——因为那里已经不在,我也从小离开了那里。这种沉重的失去,是当代读者的普遍命运,我们读乡土散文,不只是为了获得田园式的慰藉,我们在文字的镜像中辨认着自己失去的根基。

读《低处》,它的在场感因此有了悖论性质,它越是成功地让读者在场,就越强烈地提醒我们不在场的事实。作者写的蛇在纸上复活,但现实中的蛇已随着老屋一起消逝,这种悖论超越了单纯的怀旧散文,具有了一种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深度思考。

低处不是卑微,是生命的原乡。这种句子,是生命的悲悯,是蹲下身段,重新审视自己与老屋的关系。作为老屋养育的最后一茬子孙,面对即将拆除的老屋,还有那条默默守护的、与他对视过眼神的蛇,他内心纠结,终是无法释怀的意难平。

每个写作者都有对童年的回顾,我深知这种回望的艰难,这是对故乡过往情感的复杂倾注,你既不能沉溺,也无法超脱。蛇——在这里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,它既是死亡的使者,也是重生的象征。以蛇为线索,串起了童年、老屋、亲人,串起了恐惧与勇气,串起了毁灭和坚韧。

作者的语言带着鲁西北的泥土味儿,结构细致精巧,从蛇蜕到蛇蛋、蛇尾、蛇影,又从具体的蛇到抽象的蛇,层层递进,螺旋上升。他的情感是克制的,没有哭喊和控诉,只保留沉默和震惊。这种对边缘生命的敬畏,是精神根脉的回归,暗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表达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低处出发,追着光往高处走。那些被忽略的生灵,渐渐淡忘的乡野,滞留于我们内心深处,被埋在记忆里的恐惧与坚韧,就是我们精神的原乡。所谓高处的从容,全来自这些低处的沉潜。